

顺利入职

讲述：小宇（化名）
整理：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陈炜莹 蔡雨姝

父母离异时，我刚进入青春期。我跟随父亲生活，可父亲工作忙，很少关心我的感受。随着继母生下妹妹，我在这个家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家里经常争吵，我也被忽视和误解。我试图用沉默对抗世界。

长期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2020年10月的一天夜晚，离开家有段时间的我回家才发现，家里竟然重新装修了，但没有预留我的房间。看着继母的柜子里满是新衣服，那一刻我愤怒到了极点。我颤抖着双手，用打火机点燃了衣柜。随后，我被公安机关关走了。

审查逮捕阶段，浙江省余姚市检察院检察官小莹姐姐没有简单给我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而是走访了学校，调取我的成绩单，了解到我曾经是个品学兼优的少年。得知高考临近，小莹姐姐在听取我父亲和继母的意见后，认为对我拒不批准逮捕、让我先安心考试比较妥当。同时，小莹姐姐考虑到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专门聘请心理咨询师帮助我疏导情绪。在老师的帮助下，我逐渐走出心理阴影。

2021年的7月，余姚市检察院对我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宣告会上，小莹姐姐真切地说：“你的未来不该被这场火灾定义。”那一刻，我的心灵得到了释放，感觉获得了新生。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刻苦学习。带着这份决心，我考上了大学，并选择自己喜爱的机器人工程专业攻读。

大学四年，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2024年6月，我毕业了。当我满怀希望投出一份简历时，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们无法录用有犯罪记录的人员。”……手机里弹出的一条条拒绝消息像一把把刀，直戳我的内心。我尝试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却被告知因“有犯罪记录”不予受理。我跑去派出所求助，工作人员却表示“系统里有记录，无法开具证明”。那个瞬间，我又感觉世界崩塌了。

今年3月，走投无路的我向余姚市检察院递交了一封监督申请信。检察官立刻行动起来。他们调取我的案卷，核实了我放火时的年龄，确认我的情况应当适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帮我个人解决问题，还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系统性整改。

4月25日，我终于拿到了无犯罪记录证明。如今，我已经顺利入职一家科技公司，并向着成为一名机器人工程师努力前进。

在许多涉未成年人案件中，他们扮演着心理疗愈师、家庭调解员、法律引路人、社会支持者多重角色，留下自身专业价值的有力注脚。他们也在默默探索，如何在司法体系中找到精准定位、如何与司法机关有效协作——

从“可选项”到“必答题”：司法社工“进阶”之路

□本报记者 郭荣荣

当少年误入歧途，谁能为他们拨开迷雾，指引归途？在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实践中，一支新兴力量：司法社工——正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专业与温情，编织一张看不见的救赎之网。他们既是心理疗愈师，又是家庭调解员；既是法律引路人，又是社会支持者。

从个案干预的“绣花功夫”，到国家标准的“四梁八柱”，司法社工正为迷途中的少年铺设一条更科学、更有温度的回归之路。

“你们真的能救他吗？”

2022年8月，两名少年的命运因一起电信诈骗案发生改变：17岁的小王在不良朋辈教唆下协助转账赃款，16岁的小秋则因求职屡受挫走上了“赚快钱”的歧途。案发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检察院受邀提前介入侦查，并委托东营市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社工王春、胡君玫展开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小王、小秋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犯罪诱因等相关情况。

调查显示，小王尚在读中专，长期处于实习状态，虽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但他与父母关系紧张；小秋高中就辍学了，父亲正在服刑，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家境拮据。

2023年9月，公安机关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二人移送东营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24年4月，基于犯罪情节及社会调查结果，该院对二人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设定了6个月的考验期。

此刻，引导他们走向救赎的关键“钥匙”，交到了司法社工手中。

在与小王的多次交谈中，胡君玫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个核心词：“家庭功能修复”。小王吐露的心声令人揪心：父亲“看他不爽”、家人说话“让人冒火”、在家里“得不到认同和快乐”……王春作出精准判断，要根治问题必须双管齐下：强制隔离不良朋辈以治标，重建家庭支持系统以治本。

考验期伊始，小王需赴异地实习。为确保帮教不断链、监管不真空，该院迅速依托全国司法社工专业网络，联动实习地的社工组建异地协同帮教小组，运用定位打卡、实景反馈等技术手段进行动态跟踪。

与此同时，王春为小王量身定制了“最小行动”策略：要求他每日向父母发送一条平安短信。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任务，却悄然成为撬动僵硬亲子关系的支点，为重建信任埋下了种子。

相较于小王，小秋的心理防线如同铜墙铁壁。“他们母子认定我们是去定罪，所以初期的沟通举步维艰，每一次尝试几乎都在小秋‘嗯’‘没’的简短回应中草草收场。”第一次见面王春便感知到，获取小秋及其家人的信任将是一场棘手的硬仗。“对于小秋来说，父亲服刑带来的沉重羞耻感，化为了对办案人员的敌意。”王春表示。

面对这堵由敌意与沉默筑成的高墙，王春选择了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默默守护。“日久见人心，我们必须证明帮助的诚意。”司法社工团队果断调整策略，默默链接12355青少年心理热线专家进行创伤干预，帮助小秋进行心理重建，解除防御状态；链接公益资源提供“独抚温暖包”，引导小秋的母亲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加大家庭支持力度。

当司法社工全力协助检察官将小秋送入观护基地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时，一直紧绷的母亲难掩激动：“你们真的能救他吗？”

时间给了她答案。2024年10月10日，考验期届满，小王、小秋的良好表现获得了广泛认可，东营区检察院分别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重拾就业信心的小秋，顺利入职一家知名企业。小王在考取驾照后，开车来到王春办公室楼下：“春姐，这次换我送你回家！”

街景飞驰而过，这辆载着重生少年的车，正驶向不再需要司法社工护航的黎明。

但社工们的步履未停。胡君玫对记者说：“孩子们网上遇到的陷阱每天都在变化，有些推送信息常人根本收不到。不了解孩子们的信息环境，普法就是隔靴搔痒。”

“打蛇打七寸，必须比犯罪快一步升级防御系统。”作为东营市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总干事，胡君玫等于拥有一支“预防特种部队”。这支队伍正依托东营区检察院创新建立的“检察官+司法社工”双讲师机制，将帮教中提

炼的青少年心理特征、新型犯罪案例汇集成动态演进的靶向普法课程。

“依托区级‘春雨联盟’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我们实现了社会治安、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全链条参与，构建起‘预防—干预—矫治’全周期守护模式。”胡君玫表示。



图①：2025年1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察院举行不捕后跟踪帮教委托青少年社工机构开展签字仪式。

图②：2025年7月11日，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社工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组成的“四叶草”检社双讲师团队，在海淀区北下关南里社区为青少年开展“网络安全”普法宣讲。

图③：2025年5月27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检察院检察官、电竞选手、眼科医生、心理老师、司法社工组成“跨界守护团”，与中学生探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为确保实效，检察官与胡德力格尔紧密协作，为小谭量身定制了以“亲子关系修复”“认知调整”“心理干预”及“家庭教育指导”为核心的个性化帮教方案。

为矫正小谭的价值观偏差，新城区检察院在未成年犯管教所为小谭及父母开展了附条件不起诉宣告暨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安排他们实地参观监所、听取在押人员现身说法，给小谭及其父母带来巨大冲击。小谭在心得中写道：“看到里面的人，我很庆幸自己还在外面，多亏检察官给了我机会。”

考验期间，检察官与司法社工联合向小谭开展法治教育8次，组织参与模拟法庭1次，有效强化其法律敬畏感。

“社会调查摸清了关键症结，但要真正改变，必须让小谭自己意识到问题，发自内心愿意改变。”胡德力格尔从小谭感兴趣的话题入手，逐步引导他思考交友选择与未来方向，避免过早触碰创伤。

针对家庭问题，新城区检察院向小谭父母发出督促监护令，要求其对孩子加强陪伴、关注身心、纠正行为。胡德力格尔发现父母对小谭的态度很极端，认为“一定要把这个错误想法掰过来”。为此，他们设计了渐进式亲子互动活动，如每日交流、写信互诉心声。

“我们得把‘怎么干’固定下来”

当性侵害的阴影笼罩未成年人时，司法社工的专业干预如同一束微光，穿透阴霾，温暖孩子的心灵。

2024年，江西南昌11岁女童小林，在母亲单位被母亲同事王某猥亵。案发后，小林情绪崩溃，甚至对母亲章某自行委托的心理咨询师产生强烈排斥——不当的介入反而加重了她的心理创伤。

南昌市检察机关委托司法社工介入后，一场基于个体特点的精准救助迅即展开：社工首次会面选址在一个开放式森林公园，以散步、聊天替代封闭空间的问询，避免触发小林的恐惧；发现小林喜爱小动物后，社工赋予其“宠物护理员”角色，借助人宠互动引导其释放情绪；引入“OH卡牌”叙事疗法（旨在激发个体的潜意识，帮助个体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宣泄情绪），将创伤经历转化为“卡牌上的故事”，消解小林内心的自责与羞耻感，并同步以舞蹈课程帮助她重建身体自主权。

然而，干预过程中，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浮出水面——母亲章某幼年也曾遭遇类似侵害却未获疏导，导致其成年后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案发后，小林受害事件导致其创伤重现，陷入“女儿将重蹈覆辙”的绝望和焦虑。社工即刻启动“双轨干预”：通过“快乐储蓄罐”“心情猜猜看”等工具提升母女情感感知力，借助“户外园艺互动”“专属树洞时间”重塑情感纽带。最终，小林逐渐走出阴影，章某也学会了以更稳定的

帮教中，胡德力格尔发现小谭母亲几乎缺席家庭教育指导。经协调，她被请来参与。司法社工指导她学习科学方法，调和小谭与继父之间的不和，增加与儿子的单独相处时间，重塑母子关系。对疏于沟通的父亲，司法社工则通过“一对一”指导，使其深刻认识父亲角色的关键作用，反思自身，提升教养能力。

鉴于小谭在考验期表现良好，再犯风险显著降低，2024年9月，新城区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封存犯罪记录。

在专业力量的倾心帮助下，小谭成功蜕变；与父母关系改善，生活学习动力增强。如今，他已被内蒙古某职业技术学院录取，真正回归正轨。

胡德力格尔告诉记者，帮教非一己之力可成。“单靠社工或心理咨询师，很难实现被帮教者全方位改变。”小谭的转变，得益于青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强大的跨专业团队。该中心在呼和浩特市检察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团委的支持下，自2017年仅有5名司法社工起步，逐步整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律师等资源，如今已成为百余人的团队。该团队累计帮教罪错未成年人359人次，救助未成年被害人131人次，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提供有力支持。

状态陪伴女儿成长。

这起案件后来入选最高检、中社部联合发布的“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加强社会工作服务的典型案例”，成为司法社工专业价值的有力注脚。

回溯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的发展历程，这样的专业干预并非一蹴而就。

作为国内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的拓荒者之一，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于2009年应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之邀介入司法领域。此后，他们便深刻体会到专业服务面临的普遍性挑战。

“当时社会工作认知度低，本土化方法尚未成熟，处理深度创伤、代际传递等复杂个案的经验更是匮乏。”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创始人席小华回忆道，在缺乏制度支撑的背景下，争取司法机关信任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如何在司法体系中找到精准定位、与检察官有效协作，全靠‘干中学’的艰难摸索。”

成百上千个“小谭”“小林”的案例让席小华和团伙成员意识到，仅靠个案成功还远远不够，得把“怎么干”固定下来。在共青团北京市委支持下，席小华团队开始推动构建公检法社协同的“北京模式”，并参与制定《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未成年人案件社会服务规范》等市级文件。“文件明确了社工在公安讯问、性侵害被害人救助等环节的角色与流程。协作有缝隙，就用制度给它焊死！”席小华说。

2019年，最高检与团中央委托席小华团队牵头起草首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席小华视之为千载难逢的“定盘星”机会：“我们要努力把在北京蹚出来的有效经验，尤其是啃下心理创伤处理、家庭功能修复这些‘硬骨头’的方法，都融进去！”

2023年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国标”发布，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司法社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为全国司法社工工作提供了权威指南。

与此同时，席小华团队深度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提出的“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65条意见被采纳。“这不仅仅是几行字，这是给我们这行人在国家法律里‘上户口’了！”席小华感慨道，“从此，社工介入司法保护，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从个案救赎的星火微光，到支持体系的燎原之势，再到“国标”引领的希望之光，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正沿着精进专业与建章立制并行的破局之路坚定前行，只为让更多深陷泥沼的孩子被温柔而有力地托举至阳光之下。

（文中涉案未成年人均已化名）